

创作谈

戏剧舞台如何为“普通人”立像

□林蔚然

无论是原创还是改编,塑造好角色的关键都在于“贴着人物走”,不强行拔高、不刻意矮化,让人物在自己的逻辑里活起来。那些能在舞台上立得住的人物形象,最终都会成为观众的一面镜子——让我们在他们的故事里看到自己的奋进与坚守、平凡与不凡。而创作者的使命,就是擦亮这面镜子,让每一个角色的微光都能被看见

9月13日,由我执笔改编自同名电视剧的舞台剧《南来北往》(江苏省演艺集团、爱奇艺联合出品),在南京完成试演,与观众见面。两年前,电视剧播出时曾因对时代洪流中普通人命运的关注,引起广泛热议。此次的舞台剧改编,我们仍将焦点放在了这些普通人身上。普通人的形象看似可以从身边信手拈来,但艺术提炼的过程,却是要下一番功夫的。在有限的舞台时空里,如何以“小”见“大”,展现好平凡人生中的不凡故事,让观众对那些从生活中来、到生活中去的“身边人”产生共情、留下记忆,甚至将他们塑造为跨越时代的经典形象,其背后藏着一套关于人性洞察、叙事逻辑与舞台呈现的深层规律。从带着问题构思到创作中的逐步“破局”,为普通人“立像”从来不是偶然,而是源自创作者对为何写、为谁写以及怎么写和哪些挑战仍需突破等核心命题的不断探索与回应。

让“小”有根——在时代褶皱里找到人物的生存逻辑

普通人的形象之所以能在舞台上立住,首先在于他们并不是承载故事情节的单薄符号,观众认可一个人物,本质上是认可其形象塑造、行为逻辑与所处环境的“必然性”,这就需要创作者回答两个核心问题:这个人物的“痛点”为何存在?他为何如此选择?创作者在塑造人物时,必须先为其找到“时代坐标系”:人物的职业、人际关系、生活困境,都应是相应社会结构的微观投射。真正有力度的人物形象,其困境的设定也应具有可解读的空间。当人物的每一个选择都能在时代洪流与个人生命历程的交会中找到依据,“小”就有了沉甸甸的质感。这一过程中,创作者常面临的挑战是如何平衡“典型性”与“独特性”。

在我个人参与的创作中,绝大多数笔触都指向这一类人物形象的塑造。例如舞台剧《南来北往》,就是一个典型的、刻画时代奔流中普通人群像的戏。要完成好这类题材的创作,就需要从普通人身上挖掘出代表某类群体的共同经验,但又不能让 人物沦为类型化的标本。在我看来,解决之道就在于捕捉共性中的个性细节:这些细节不是凭空想象,而是需要创作者深入生活场景观察、记录,从无数个“相似”中提炼出“这一个”的不可替代性。

我从小在东北长大,对这片热土上人们的生活和方言特点都非常熟悉,这为我创作或改编东北题材的作品提供了天然的养分。面对《南来北往》中的主人公马魁这一角色时,我牢牢地抓住“轴”这个鲜明的人物个性特征。在对原作故事进行重新结构的过程中,我始终把焦点放在如何让“轴”这个人物个性与具象的东北大地碰撞出化学反应,将主人公对工作的热爱、对妻女的愧疚,以及他与徒弟汪新的恩怨冶于一炉,最终提炼出一个重情义、九死不悔、铁骨铮铮的东北汉子形象。于是马魁这个人物的“小”就有了生活的根,有了典型的东北特色,将之立于舞台上,便有了与众不同的质感和味道。

在舞台上浓缩时光、提炼时代精神



话剧《南来北往》剧照 孙 珣 摄

是一件困难却又必须要完成好的创作任务。如何从娓娓道来的长篇叙事中,提炼出舞台故事的精髓?在对《南来北往》的改编中,我们选取列车与小院作为核心叙事空间,由剧中人作为讲述者,还原时光链条中人物命运的关键段落,突出不同时空人物的在场性。舞台上的每一个人物都在共同经历着时光的洗涤,推动讲述者和倾听者之间的关系变化。在人物命运背后,时代的发展也恰如列车不断前行,一段段记忆中的情感奔涌,时而静水深流,时而浪涛翻滚。而如何写好群像中的师徒情、父子情,以及始终闪耀的理想之光和时代浪潮中的人生百味,则是我们要着力思考的部分。

让“情”有痕——用具体行动替代抽象抒情

塑造好普通人,往往不在于为 人物写下多少豪言壮语的台词,而在于如何刻画那些藏在人物日常行为里的情感痕迹,让观众在人物的身上和行动中看到自己的影子,这就需要创作者跳出直抒胸臆的写作惯性,用行动逻辑串联起人物情感的发生与递进。“没有行动的情感是空洞的,没有情感的行动是盲目的。”写好普通人的情感表达尤需如此。如何将普通人的爱恨情仇转化为具体的戏剧行为,并且符合人物的身份与性格,作家刘恒编剧的《窝头会馆》就给我很大启发。剧中,肖启山对儿子的爱从不是直白的“我为你好”,而是偷偷卖掉祖产为儿子治病,被发现后又嘴硬地说是“嫌这破房子碍事”。这种“口是心非”的行动,比任何抒情台词都更能体现一位父亲的隐忍与笨拙。

2022年,我们在历史题材话剧《西迁》中,就是抓住了“行动”这一戏剧要素从而完成了群像中个体弧光的呈现。在“公路戏剧”叙事模式基础上,剧中各类人物粉墨登场,带着各自的困境踏上西迁之旅,一路经历成长和觉醒,最终做出了有

违初衷却契合家国大义的人生抉择。剧中,饲养员吴俊从为了两根金条上路,到为了救回小牛犊牺牲;学生袁天养从为了心爱的女孩子加入西迁队伍,到最终接过神仙的嘱托带领动物大军抵达重庆……这些大历史中的普通人形象正是通过各自独特的行动展示出其内心情感的变化。历史是由人民推动的。荃草虽然渺小,却遍布寰宇,他们觉醒后也会奋不顾身,这也是剧本《西迁》希望带给读者和观众的一种思考和感悟。

如何把握好“情感的层次感”,也是戏剧创作中的一个关键。《西迁》中,医生欧阳白宣称再也不替人类看病,却在西迁过程中悉心为王英郁诊疗;军官邢灿表面上称自己只对顾小姐一人负责,却在关键时刻引开日军,为动物大军争取脱险的时间……这些“心口不一”的瞬间,正是人性复杂性的体现。这需要创作者像剥洋葱那样,让人物的情感依托具体的行动支点,在不同情境下层层显露。

让“魂”有光——在局限中写出无限的可能性

要写好普通人,创作者还要写出人物在自身局限中对尊严、善意或希望的坚守。写出人物身处泥泞,却仍向上生长的无限可能。

曹禺笔下的陈白露(《日出》),招待客人时的游刃有余,与独处时对镜自语的疲惫形成了对比;这种“在妥协中坚守底线”的矛盾,写出了人物虽被生活磨去棱角,却在某个瞬间暴露出的骨子里的倔强。它启示我们,在创作中需要找到人物的“精神锚点”——支撑人们在困境中不崩塌的信念看起来越“小”,其背后折射出的力量就越大。

原创作品,创作者常困惑于如何让写作不显得刻意。在我看来,解决之道在于“让信念融入日常”。以2021年我创作的反映北京“回天地区”改造成果的话剧

《喜相逢》为例。剧中,外乡人孙老师在天通苑生活数十年,退休后一心想要办一个书法班,丰富邻居的文化生活。他虽沉默寡言,但日拱一卒,去世前捐出了自己的积蓄和作品,就是想让书法班在天通苑落地生根;退休的社区主任关姨经受着丧子之痛,却为天通苑地区居民的用水问题不辞劳苦、整日奔波,最终让干净的自来水流入天通苑社区的千家万户。孙老师的愿望没有多大,可能应者寥寥;关姨也只是我们身边无数忙碌的普通社区工作者中的一员。但他们老有所为、要发挥余热为社会做贡献的人生态度与追求,是点亮生活的光,这光也照亮了我们的舞台。

如何看待并写好普通人的“不完美”,是创作中的另一大挑战。不少作品为了让人物“讨喜”,会刻意回避角色的性格缺点,结果让角色显得扁平。事实上,要想写好普通人的“魂”,并非不能写人物的不足,关键要写出他们在那些特殊时刻能展现出的意想不到的光芒。

塑造好普通人的形象,本质上要处理好“小”与“大”的关系。创作者要带着问题进入创作——人物的“小”里藏着怎样的“大”?日常琐碎里有着怎样的精神追求?性格缺点中又蕴藏着怎样的人性光辉等。同时也要在写作中不断调整策略:当人物行动不符合逻辑时,回到时代背景找根源;当情感表达显得空洞时,用具体动作替代抒情;当精神内核不够突出时,在日常细节中埋入信念的种子,等等。

无论是原创还是改编,塑造好角色的关键都在于“贴着人物走”,不强行拔高、不刻意矮化,让人物在自己的逻辑里活起来。那些能在舞台上立得住的人物形象,最终都会成为观众的一面镜子——让我们在他们的故事里看到自己的奋进与坚守、平凡与不凡。而创作者的使命,就是擦亮这面镜子,让每一个角色的微光都能被看见。

(作者系中国传媒大学戏剧影视艺术学院博士研究生、一级编剧)

“纪念抗战胜利80周年 舞台美术作品展”开幕

本报讯 9月13日,2025年度国家艺术基金资助项目、由中央戏剧学院主办的“纪念抗战胜利80周年舞台美术作品展”六城巡展首站在京拉开帷幕。展览以舞台美术这一独特艺术形式为纽带,串联起80年前的烽火岁月与永恒的和平守望。

中央戏剧学院院长郝戎表示,舞台美术作为一门综合艺术,以独特的视觉语言、空间营造和情感力量,将历史瞬间、英雄气概和民族精神凝结于舞台之上,直击观众心灵。中央戏剧学院作为新中国第一所戏剧教育高等学府,自创校之初便与民族命运紧密

相连。此次巡展不仅是地理上的跨越,更旨在通过艺术作品激发公众的历史共鸣,凝聚起推动民族复兴的强大精神力量。

此次展览汇聚了中央戏剧学院舞台美术系教师边文彤、孙晓红、张华翔、曲明、吴侠、高峰、崔晓东的创作成果,展示内容涵盖舞美设计、灯光设计、服装设计、化妆设计等专业。后续,展览还将走进山东济南、河南郑州、陕西西安和宝鸡,最终抵达革命圣地延安,沿着这条串联起多座城市抗战记忆的路线,完成一场“心向延安”的精神寻根之旅。(路斐斐)

文艺的跨媒介共生

根据冯骥才同名原著改编,由黄维若编剧,钟海导演,刘敏涛、谷嘉诚等联袂主演,天津人民艺术剧院创排的话剧《俗世奇人》,以清末民初的历史与市井生活为背景,将舞台主场景设置为天津老城首善街的“炮打灯”酒馆,以善良智慧、敢爱敢恨的老板娘关二姐为串场人物,进行了极具地域性、风俗性与传奇性的时代生活呈现和各色人物刻画,为观众献上了一台思想艺术质量上乘的话剧佳作。

以天津方言和中国古典小说白描笔法创作而成的短篇小说集《俗世奇人》,由54篇并不直接关联却又旨趣相同的作品构成。这些小说以质朴醇厚、韵味绵长的故事与语言,对天津大运河畔百多年前的社会生活做出了精准生动的描绘,将当时的社会风貌、五行八作、人情世故和百态人间鲜活地再现于笔端,虽描写凡人俗事,却颇具传奇色彩,读罢令人回味无穷。然而,如何将原小说中各不相干的一系列民间奇人奇事熔于一炉,成功实现舞台艺术的跨媒介改编?这就格外需要改编者匠心独运的创新创造。剧中我们看到,剧作家将原著各自独立的短篇佳构进行了大手笔的有机重构,以类似于话剧《茶馆》的方式,将酒馆这一典型环境和关二姐这一特定人物作为媒介,生动展现了社会变迁下的世间百态,既保留了原作的精髓,又赋予了作品全新的戏剧生命力。

关二姐是剧版《俗世奇人》的核心角色。作为运河边上的酒馆老板娘,人到中年的她已见多识广,阅尽人间冷暖而世事洞明,古道热肠又独具魅力,吸引南来北往、旧识新交之人汇集于小酒馆,奇人异事也纷至沓来,上演一幕幕俗世人间百态故事,剧作也因此具有了云起雨落、其味无穷的观点和“嚼头”。此外,剧中还别出心裁地将关二姐从娘娘庙里“拴”来的泥胎娃娃,设置为一个人偶同体的“娃娃大哥”角色,让其作为冷静的旁观者和全知全能的讲述者,与关二姐共同起到串联人物情节的作用,在增强该剧表现力的同时,更令作品呈现出同主题相谐的戏剧样貌与特异品质。

于是,一个个人物在酒馆陆续登场。我们看到了关二姐丈夫、懦弱善良的酒馆老板六喜;敢穿一身黑衣刷墙的“刷子李”;顺天成营造厂技艺精湛的彩画师傅“画笔韩”;捏啥像啥、作品栩栩如生的“泥人张”;捏出来的包子一圈十八褶、生意兴隆以至于没工夫搭理人的高贵友(“狗不理”包子创始人);接骨医术高超的“苏七块”;能够“以牙识人”的华大夫;以说书为生、口若悬河的白四爷;受人蛊惑变卖家藏的蔡二少爷;热衷模仿洋人做派、行为滑稽的巴皮;讲交情、重义气的大哥李金鳌,等等,林林总总、不一而足。不同的生活际遇与个人秉性,造就了每个人物极具辨识度的个性特征,这些性格奇特、行为、品性迥异的奇人奇事在小酒馆汇聚交织,演绎出一幕幕轰轰烈烈、精彩绝伦的戏剧故事。

话剧《俗世奇人》将奇人之“奇”体现在对人物奇特性格与所做奇事的塑造刻画上,如“炮打灯牌”酒一样“劲儿”大,喝下去“跟那过年放的炮仗一样,腾一下直撞脑袋门子”。比如,泥人张在戏园子里一边看戏一边在袖子里捏泥人,捏完拿出来一看,跟台上的角儿一模一样,神奇得令人咋舌;车夫李四骨折后求苏七块正骨,苏七块展现了原著中描述的精妙高超医术:“但只见一双妙手犹如一对白鸟,上下翻飞,疾如闪电,只听得咔嚓咔嚓的几声,骨头接上了。”如此俗世百态的展示,成为话剧颇具奇趣的部分。再如,画笔韩要把闺女玲儿嫁给当铺老板家的傻儿子,玲儿却要同刷子李的儿子柱子私奔,关二姐在其信惑困顿之际为她指点迷津;李金鳌虽是“道上的人”,却乐于拔刀助人,在天津发大水时救助了上海名角小杨月楼和戏班子,又在上海借小杨月楼之力,帮上千个从天津去黄浦江码头扛活的挨冻的弟兄们脱困;嘎杂张五设局借绑票给关二姐放高利贷敲诈,李金鳌摘下一只扳指,去金店借了五百块大洋帮关二姐还债,说是为了报答她曾用七块大洋救助了其摔断了胳膊的侄儿李四之恩德。最终,警察抓走了张五,大快人心地使其恶行得到了惩罚,而善有善报,关二姐在久盼之下也终于“有喜”了——这一笔在剧中仿佛轻轻带过,却有着强烈的人生况味。凡此种种,一系列人物、事件都在编导的悉心编织下血肉丰满、环环相扣,展现出扣人心弦的艺术力量。

作为一部展现京津冀地区深厚文化底蕴的话剧作品,《俗世奇人》从小说到舞台,经过编剧、导演、表演、舞美等主创的精心打造,以耐人寻味的充满历史与人文气息的人物、故事、细节等戏剧情境,既展示了天津作为联通南北的水路码头所独具的历史文化风貌,又如时代生活的一页切片,展现了百年前运河之畔百姓的烟火日常与生活变奏,以及他们内心情感和精神世界的丰富肌理。舞台上的他们既有豪爽义气的一面,也有谨慎小心的一面;既有自信自赏的一面,也有自嘲自讽的一面;既有牛气孤傲的一面,也有幽默旷达的一面,充分展现出角色及其所处时代的丰富与复杂。

话剧《俗世奇人》将一群看似平凡却身怀绝技的普通人搬上舞台,通过他们充满天津味道的行为举止,不仅张扬了浓郁的地域文化特色,而且融入了厚重的人文关怀。这些角色在特定年代与环境中成长,他们的故事既真实动人,又充满传奇色彩,让观众在笑声与感慨中产生强烈共鸣。剧中演绎的虽是生活的“过去时”,但其强烈的穿透力和鲜明的当下感,亦让人们从这部跨媒介改编的舞台佳作中,感受到了不同艺术形式的交融之美以及艺术跨界融合的无限可能。

(作者系文艺评论家)



话剧《俗世奇人》剧照

话剧《俗世奇人》

生动而厚重 平凡又传奇

□汪守德